

太平天国社会经济史辨正*

王明前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照旧交粮纳税”、“着佃交粮”和田凭,是太平天国史中具有特色的社会经济政策。“照旧交粮纳税”政策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随着西征的展开和统治方式的转变,很自然采取的社会经济政策。后期苏福省、浙江省当局普遍实行的是“着佃交粮”与“招业收租”并举的政策。“着佃交粮”不仅没有改变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土地所有权关系的现状,也没有减轻佃农的社会负担,因此不具有任何社会经济变革意义。颁发田凭是太平天国农村政治中最高水平的社会经济政策,其政治意义大于法律意义,不能作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发挥革命性作用,因为它仅仅是对现有土地关系的确认。

关键词: 太平天国;“照旧交粮纳税”;“着佃交粮”;田凭

中图分类号: K25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695(2010)02-0069-07

“照旧交粮纳税”、“着佃交粮”和田凭,是太平天国史中具有特色的社会经济政策。罗尔纲先生高度评价了“照旧交粮纳税”和“着佃交粮”政策:“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因天京缺粮的紧急情况,不得不采用‘照旧交粮纳税’措施。它根据具体的情况,顺应农民的愿望,先行‘着佃交粮’政策,一反千余年我国田赋制度的常规,变地主交粮为佃农交粮。其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进一步颁发田凭,宣布凡佃农领凭后租田概做自产,把土地所有权从地主转移到佃农手中,使行‘着佃交粮’广大地区的佃农得到了自己所耕的田。太平天国并没有颁布‘耕者有其田’政策,而在它所施行的土地政策的结果事实上竟成为‘耕者有其田’了。”^{[1]809-810}对田凭政策,罗氏做出如下区分,一为“专作为地主收租证明用的”,一为“从‘着佃交粮’政策向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而颁发的太平天国新土地证凭证”,两者“名同而实异”。^{[1]806}笔者拟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对太平天国经济史的这三个特色政策做进一步研究。

一、“照旧交粮纳税”辨

“照旧交粮纳税”政策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随着西征的展开和统治方式的转变,很自然采取的社会经济政策。关于“照旧交粮纳税”政策,有论者将之与《天朝田亩制度》(以下简称《制度》)相联系,认为是因为“《制度》的分田法因不具备施行的环境,而它的农村‘国库’制是不符合农民意愿的错误主张,因而不能贯彻施行”,同时“1854年夏季时,天朝总圣库告匮,天京发生粮荒,亟需筹措军需与民粮”,导致太平天国被迫实施“照旧交粮纳税”政策。^{[2]169-173}这种说法将“照旧交粮纳税”与《制度》相联系,略显牵强。太平天国政权虽然制定《制度》,并于1853年11月颁布之,但是并未对之广泛宣传,更无意推行。太平天国贡役制的权力结构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实行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和建立公正原则的农村政治。而把天京粮荒问题与“照旧交粮纳税”相联系,也缺乏必然逻辑关系。在太平天国史上,因为粮荒即总圣库危机引发政策改变的事,也曾在1852年的永安发生过。太平军在永安半载,“粮草殆尽,红粉亦无”,^{[3]484}被迫于1852年4月5日突围,以“寻求补给和喘息,在困境中杀出生存发展的出路”。^{[4]293}既然定都天京后发生粮食危机,太平天国决策层难道不可以效法永安突围的前例,全军继续战略转移,如北伐燕都吗?太平军如果单纯出于解决粮荒问题,完全可以放弃南京。而如果为了取得粮食等战略物资,安徽和江西也不是最理想的选择。比南京更处长江下游的苏南浙江地区是中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

* 收稿日期:2009-09-17

作者简介:王明前(1971—),男,江苏苏州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负担着中国最沉重的漕粮田赋。如果单纯解决粮食问题,完全可以东征苏南,且当时条件也完全具备。看来,争夺安徽和江西实际上完全出于政治目的。因为既然以长江下游重镇南京为政治中心,就必须沿江上溯争夺中上游以固金陵根本,而这也正说明了定都后太平天国政权战略任务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必然带来社会经济政策的变化。“照旧交粮纳税”就是这种变化的结果。

太平天国实施“照旧交粮纳税”,应该认为是统治方式转变的必然结果,而且是一个自然的过渡,并不需要经历《制度》碰壁或总圣库危机这样的沉痛反思。因为定都前,太平天国作为一个流动的军事政治团体,对沿途城镇据点只能随占随弃。一切军需给养,自然全部依赖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总圣库制度,即一切财产与缴获归国库所有和平均分配,所以社会成员被拆散家庭,分男女行共同生活。对所占领城镇,太平天国通过吸收人口来充实队伍。这一方式一直实行到定都为止。太平军在湖南、湖北和安徽都吸收了大量人口,将他们编入由拜上帝会众支配的社会组织里。沿途获得财富也尽收归圣库。可以说,太平天国是以滚雪球的方式将人口和社会财富逐渐积累和扩大的。这个庞大的社会集团在天京时形成一个以广西客家人贵族为特权集团的贡役制的社会结构。^[5]在这一时期,太平军走州过府的行军模式,使他们不可能真正接触农村社会,更不可能实施农村政治。因此,永安突围后处于流动作战途中的太平军,自然无法实现“照旧交粮纳税”政策。而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既然确定了自己的战略基地和政治中心,就此完成了流动作战阶段,流动王国就真正成为一个与清朝对立的区域性农民政权。太平天国开始实施正常状态下的农村政治,社会经济政策的相应转变是十分自然的。特别是他们在西征时不可避免地接触到农村社会,面临着实施农村政治的问题。在太平天国由于主观认识能力和客观现实条件的局限,而不可能实施《制度》规定的平分土地政策的前提下,在太平军贵族集团缺乏行政经验的情况下,沿袭清朝旧制,采用传统的地方行政,就变得十分现实。这是一个必然转变过程中的自然过渡。

所谓“照旧交粮纳税”,就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的自然过渡的产物。这一政策虽然直到1854年夏才以“本章”形式确定下来,但实际上早就随着西征的展开而逐步实施了。1853年6月在赖汉英指挥的西征军围攻南昌期间,就实施了“按亩征粮”的政策。邹树荣《藕青诗草》云:“计亩征粮忧富室(乡间计田一石,或出谷一石、二石不等,分与无田者食,于是有田者多受累)、得钱相搏快游民。吾村前后分三次(吾家一回出谷五十余石,一回出谷三十余石,一回出谷二十石),此举难期苦乐均。”^[6]赖汉英的政策虽然仍然是征贡性质,但是已经具备了传统经济政策的某些特征。“计亩征粮”,即按照田地数量确定征收标准,这符合传统经济政策中漕粮与田赋的特征。石达开1853年9月到安庆督理军民事务,“张伪榜,假仁义,要结民心,网罗无赖充伪乡官,征租赋”。^[7]“征租赋”政策,绝对是传统的社会经济政策,即土地所有者向佃农收租,并向国家交纳赋税。在当时杨秀清僭主政治条件下,石达开的施政肯定是在得到杨秀清的首肯后才得以推行的。这样,石达开主政安徽时的“征租赋”政策,已经可以认定是太平天国实施“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直接证据。至于1854年夏的“本章”则是法律程序,旨在向天国辖区推行。因为“建都天京,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又因为“安徽江西米粮广有”,所以太平天国领导人才“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8]意思是,太平天国确定天京为政治中心后,将夺取全国政权作为主要任务。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政治和军事任务,太平天国今后将以开拓疆土和战略基地为主要任务。而“米粮广有”的安徽、江西占领区,正可满足“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的现实需要,所以天国要着手实施“照旧交粮纳税”政策,迅速恢复地方行政,使之服务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需要。“建都天京”带来的战略任务转变是因,“安徽江西米粮广有”是客观条件,而“照旧交粮纳税”是自然发展而来的结果。由此可证,“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与《制度》实在是毫无关涉,亦于天京粮荒无必然联系。这一政策随着西征军事活动的展开,就已显端倪,赖汉英在南昌附近的“计亩征粮”就说明了这一点。而石达开安庆安民时的“征租赋”则说明这一政策已经进入成熟实施阶段。在这一基础上,杨秀清主持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决定推广这一政策,促进太平天国施政方式的良性转变。

二、“着佃交粮”辨

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太平天国在苏南浙江地区推行的所谓“着佃交粮”制是太平天国的创举。郭毅生先生认为“着佃交粮”与历代以及清朝封建政权的政策不同,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新鲜事物。因为太

平军的扫荡造成大量地主的死亡和逃亡,于是“业户交粮”的情况便不存在。同时太平军的到来助长了本已高涨的抗租斗争,使仍留在乡的地主很难收到地租,使地主因地租收入少于向政权交纳的田赋支出而使业户交粮很难实现。太平军鉴于财政军需将面临匮乏之虞,只有采取“着佃交粮”这种利多弊少的办法。郭先生是在否定了直接向地主交租的三个条件后,得出太平军的这一政策的。他认为太平军因为不可能与农民对立,所以不会镇压佃农抗租。于是太平军要么劝佃农交租,要么撇开地主直接向佃农征粮而不管收租。既然劝佃农交租也难以满足太平军政权的现实物质需要,于是“着佃交粮”就变得顺理成章了。^{[2]239-245}

其实,太平军完全有条件在这时推进更深刻的社会变革。既然封建势力已经在太平军的“打先锋”军威下遭到沉重打击,封建统治秩序已经崩溃,而农民抗租斗争的热情又这样高涨,那太平军为什么不采取更激进的社会变革,如平分土地,或至少立刻承认业主缺失状态下实种佃农的土地所有权,以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呢?但实际上,太平天国苏福省、浙江省当局普遍实行的却是“着佃交粮”与“招业收租”并举的政策,而且“着佃交粮”因为没有在产权问题上做出明确确认,不仅带有临时应急的特点,在理论上也有诸多模糊不清之处。

首先,“着佃交粮”并未改变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土地所有权关系的现状。相反,太平军不过是对业主缺失状态下的土地实施“着佃交粮”,对业主在乡者仍然允许地主收租,甚至实行“招业收租”,呼吁逃亡在外的业主回乡从事经济活动。对佃农的抗租行为,太平军在法律上加以明确反对,甚至冠以“顽佃”恶名。这样,从性质上看,“着佃交粮”就与允许地主收租没有本质区别。土地所有权根本没有变更,佃农仍然没有获得土地所有权,太平军只是把原来应该由地主负担的税收责任,转嫁到原地主的佃农身上。佃农仍然是佃农,尽管这时业主处于缺失状态。佃农虽然不再向原地主交租,可是被迫继承了原来业主的所有负担。

苏州三县因忠王李秀成的亲自关注,其农村政治在太平天国各地区比较典型。在具体操作中,太平天国苏州当局根据土地实际耕种的情况,采取“着佃交粮”和“招业收租”并举政策。主持长州事务的斑天安黄某出示:“姑着各佃户,代完地漕,俟业户归来,照租额算找。其在乡业户,仍自行完纳,照旧收租,不准抗霸。上年又经招业收租,并饬抚天侯徐,饬令各乡官设局照料,毋使归来业户,徒指望梅各在案。乃因未定租额,致有五斗、二斗、颗粒无着者,苦乐不均,盖由佃户畏强欺弱,亦由乡官弹压不周。”^[9]此示精神有二:其一,太平天国当局根本没有、也从未打算授予佃户对实种土地的所有权。此示题记为壬戌十二年(1862)九月十八日,斯时天国苏福省建政已经二年有余,仍然在强调佃户须完地租漕粮,不仅说明该政策的临时代行性质,也说明天国并未有意在产权问题上让步。相反,太平军当局充分强调的仍然是“招业收租”和“设局照料”。其二,天国当局把“苦乐不均”的责任完全推给佃户的所谓“畏强欺弱”,并未支持佃户的抗租要求。当局或许认为,天国此时立政,以征粮办赋为急务,既已宣布“着佃交粮”,明确佃户代业户完粮的义务,则佃户理应完成足额完粮纳赋的任务。而对于佃户一方而言,他们肯定会为代业主完粮,却又不能取代业主产权而不满,故有意“畏强欺弱”,与天国当局周旋。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天国当局只好在坚持肯定原业主产权和要求佃户代业主交租完粮的前提下,采取折中办理的稳妥策略。斑天安黄某在考虑“本年入夏久雨,车水栽秧,米价昂骤。高区佃户工本数倍在田,而应征正杂款项,大率出于佃户代完”的情况下,决定以下列原则办理下忙及漕粮征收:“还租自完田凭者,每亩三斗二升;佃户代完者,每亩二斗五升,高区八折,以抒佃力而昭平允”,对代完地租漕粮的佃户有相当程度的照顾;同时重申“如有顽佃抗还吞租,许即送局比追。倘有豪强业户势压苦收,不顾穷佃力殫,亦许该佃户据实指名,禀报来辕,以凭提究”的公正原则。^[9]同月黄某的另一份札谕在重申上述细则的同时,指示“乡官设局照料弹压”,目的是“使各业户均有租收,各佃户均无亏耗”。但这种理想的业佃互利格局似乎很难实现。黄某在这份札谕中陈述了“在城业户星散寄居,上年归来收租,多半向隅空转;而各佃户代业完纳各款,所垫已巨,且高区佃户工本数倍在田”的现实,^[10]说明太平天国执政二年来,“招业收租”成效甚微,“自完田凭者”并不踊跃。其实太平军对业主的政策并非不优厚。业主不领太平军田凭的原因多半或许出于政治考虑。因为一来太平天国前途尚不明朗,二来一旦领凭就将承担天国的一切

义务。这样的结果导致佃户因此“所垫已巨”，于是佃户对代业主完粮也不踊跃。而当局重申要乡官弹压，则更说明“着佃交粮”并非是要承认实际耕种者的土地所有权。

而常熟实行的由乡官局代收地租的制度，则使“着佃交粮”变相成为乡官愚弄太平军的手段。乡官局推行的表面上仍然是“着佃交粮”。咸丰十年（1860）十一月“十三日，（军帅汪）到镇安民……即谕着办大漕。查造佃户细册呈送，不得隐瞒。着各旅帅严饬百长司马照佃起征……二十日，设局太平庵，着佃起征田赋”。^{[11]50}但征收范围很广，不仅漕粮、地丁银按常例征收，“狄家坝新充里正，设局补粮，三斗加一斗，下忙银一百六十，局费解费钱二百，每斗折钱三百”。^{[12]63}又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初七，“曹和卿同拟各佃凑钱赔偿，并起事各图办上下忙银各三百，外加二百六十文以赔夏赋”^{[12]65}，而且“伪帅（钱桂仁）听旧书吏王某言，拟每亩办粮三斗，亩贴费钱二百十四，各乡官经理。余如门牌、船凭，亦须二千文，统归各帅，生财之门颇多”。^{[12]51}总之，“贼之征粮，十年之冬，花田每亩六七百文，稻田每亩三四斗，业户不得收租。后一年加一年。至元年分，花田每亩加至二千余，稻田每亩加至一石余，又两忙征钱加至五百余”。^{[13]341}常熟的乡官局代收方式，在强调“着佃起征田赋”的同时，也希望尽可能做到“业户不得收租”。这是常熟方式与苏州典型方式变通的地方。苏州也要求乡官局“设局照料”，但是所照料的恰恰是“归来业户”。而在常熟，业主这一环节被人为蒸发了。

浙江绍兴佐将周文嘉于1862年农历九月秋收时“张示征厘谷，约以三分归佃者，以三分许兵粮，以四分归田主。田主收租，必领局票，票有费繁重”。^[14]周文嘉的政策是根据土地实际占有情况分两种方式征收田赋：一为业主缺失状态下的“着佃交粮”，一为允许田主领凭收租。可见，在太平天国苏福省和浙江省，普遍实行的“着佃交粮”制，虽然具体方式有所差别，但总的精神是不变的，那就是“着佃交粮”并不涉及土地所有权的变更，也并不妨碍业主的收租。

其次，“着佃交粮”并未减轻佃农的社会负担。认为“着佃交粮”满足农民利益要求的论者一般同意以下两个命题：一是太平军通过“着佃交粮”，事实上认可了佃农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15]209}；二是农民不必再遭受地主的地租剥削，因而佃农十分欢迎这项政策。^{[2]261}但是，和这些论者的愿望相反的是，太平军唯一的政治目的是能够得到稳定的财赋收入，因此他们没有意识主动掀起一场社会经济变革，推行更有革命意义的社会经济政策。“着佃交粮”与同时进行的“招业收租”的性质完全无异，因为二者都服务于太平天国的基本统治需要。太平天国政权要求佃农交粮却不承认佃农对实种土地的产权，这至少说明阶级分析论者所希望的对农民的政策倾斜根本就没有发生。相比较地主可以继续收租状态下的佃农，“着佃交粮”状态下的佃农虽然名义上不再向地主交纳地租，但是实际上他们向太平天国交纳的赋税里，有一部分相当于原来的地租，同时因为他们要代原来地主交纳田赋，因此赋税的另一部分应该相当于原来地主要交纳给政府的田赋。这也正是太平天国实施“着佃交粮”的意义所在。因此决定佃农是否支持“着佃交粮”的因素，便与太平天国政权的所谓性质无关，而取决于现在佃农要缴纳给太平军的赋税，其数量是大于还是小于原来的地租。从佃农普遍高涨的抗租情绪看，他们是不太满意“着佃交粮”的。

苏州当局对佃农具体负担的解释比较含糊。前文已述，斑天安黄某只是在“高区佃户工本数倍在田，而应征正杂款项，大率出于佃户代完”的情况下，以“还租自完田凭者，每亩三斗二升，佃户代完者，每亩二斗五升，高区八折，以抒佃力而昭平允”的原则，给代完地漕的佃户一定的照顾。这已经十分理想。常熟实行的由乡官局代收地租完粮的政策，则无论业主还是佃农，情况都不乐观。关于洞港镇的记载比较详细：“见绅董军监收租米，朱局纷嚣，定每石收九成，其佃户已完下忙银者收七折二，加费钱一百十四，除粮三斗二升，局费一斗，田凭一斗，委员监督费一斗，业主约归一斗，出帐房挂号钱二十；自业者完粮，连费五斗二升，又钱一百十四”。^{[12]80}除去各项杂费，该地“着佃交粮”下的佃农在完下忙银后仍需交纳租米的百分之七十，还要代原业主交纳田凭费，租米还包括名义上的业主收入。但从“自业者完粮”和佃户缴纳田凭费看，该地还是允许领凭收租完粮的。从实际负担看，佃农粮、局费、田凭、委员费和原业主应得各项，总额达七斗二升，即便七折二，也在五斗左右，而自业者连费才五斗二升，且业、佃各类费钱均为一百十四文，佃户还多出挂号钱二十文，虽说并不多，但是佃户代交比业主自收完粮，并没有多少优惠，更别说佃户已代原业主交纳地丁银了。这还是在所谓对“着佃交粮”的佃农优惠的前提下。在

太平天国当局因军情紧急而加紧派捐的情况下,在乡官局把持征税事务有可能中饱私囊的条件下,无论业佃,实际负担都很沉重。业户方面,“二年无租,饿死不少,幸而降价鬻田佃户,十得二三,何以延命”。绅士龚又村准备“特拟稟稿请照金匱、长洲、昆新例,准业主收租,与同人商酌,或动公呈,俾批示遵行,则业主不绝生命耳。惜现定粮重,再加民租已复全额,而明年上下忙仍无着落”。^{[12][114]}看来苏州样式对常熟业户是有吸引力的。佃户方面,既未获得片纸产权,却又继承一切原业主负担,怨气自然极大。他们自发行动起来,抗议乡官局的勒索。“乡官局欲兼收租粮,农民不服,汹汹欲结党打局,后出伪示,只收粮饷”。许多地方的收租局难以建立起来。咸丰十一年(1861)“二三月间,钱华卿、曹和卿等创收租之说,各处设立伪局,按图代收,令业户到局自取。旋于四月中,吴塔、下查家浜之伪局,被居民黑夜打散,伪董事及帮局者皆潜逃,其事遂止”。^{[13]352}常熟地区的抗租斗争在清朝统治时期就十分蓬勃,太平天国时代仍然延续,这至少说明太平军并未真正解决好地方行政腐败这个社会经济痼疾问题。常熟以乡官局代收地租粮米的政策,由于乡官局基本排斥业主自行收租交粮的权利,加之太平军更关心乡官们的经济实绩,而对他们政策的社会效果,或无可奈何,或听任放纵,自然监督不力,当然就无法杜绝他们中饱私囊。在这种制度下,无论是被剥夺收租权利的业主,还是变相负担了原业主负担的佃农,其境遇都没有向好的方向转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恶化了。这说明即便在地主存在的条件下太平军也有可能实现“着佃交粮”,这是因为太平军意识到佃农的抗租意识有可能借助他们带来的社会动荡而增强,因此太平军或者在法律上明令保护地主收租,或者抛开地主直接“着佃交粮”。这更可证明“着佃交粮”毫无社会经济变革意义可言。

绍兴佐将周文嘉 1862年农历九月的“着佃交粮”,则更直观地揭示了“着佃交粮”的内部结构关系。其具体份额为“约以三分归佃者,以三分许兵粮,以四分归田主”。^[14]斯时苏福省和浙江嘉兴实施“着佃交粮”已有二年,这应该是周文嘉汲取天国近年执政经验的结果。其总收入中分为佃农、兵粮和田主收入,大体各占三分之一。佃农只保有三成,他要把收入的大部分上缴给太平军。上缴部分,一部分名义上归田主,一部分则直接做太平军的军费“兵粮”。名义上归田主的部分,因为田主缺失,实际上也归太平军当局支配。这样佃农在“着佃交粮”情况下,除了必须替田主承担义务田赋外,还不得不把名义上交纳给田主的地租也缴纳给太平军。由是观之,佃农的赋税比原来的田主至少不会减少。而绍兴太平军通过“着佃交粮”不仅征收到原来法定的田赋,而且借为田主收租,多收取了原来佃农缴纳给田主的地租份额。可见在“着佃交粮”下,佃农的负担至少不会减轻。周文嘉虽然也允许田主收租,但实际上这些业主除了要被迫向乡官局支付高昂局费外,佃农也不会轻易交租给他们。田主范城 1861年冬“向佃户收租如乞丐状,善者给数斗,黠者不理或有全家避去者”。^[16]太平军的所谓许可没有实际价值。“着佃交粮”才是太平军最有效率的征赋方式。

三、“田凭”辨

田凭是太平天国当局发给土地所有者的证明,具有法律效力。目前发现的田凭实物只有五件。如忠王李秀成发给花户陈金荣的田凭,准他“每年遵照天朝定制,完纳米银不得违误”,并保证“如有争讼霸占一切情事,准该花户稟请究治”。^{[17]139}李秀成对田凭政策的重视可在“勋天义兼苏福省文将帅总理民务汪宏建钧谕”引用的忠王瑞谕中得以体现:“本藩胞与为怀,时以恤民为念。因思田凭上忙、海塘各款,均关紧要,本难推诿迟误。但查本年虽丰,蚕桑久旺,若令一律呈缴,势难兼顾,且近年米价昂桂,民力未纾,殊堪悯恻。若不量为变通,甚非加惠黎元之道。今酌议仍责成各佐将,先办田凭,次征上忙,再追海塘经费。次第举行,以纾民力,并勒限完纳蒂欠。”^[18]

田凭一项在天国前期施政中始终未涉及。而李秀成却先办田凭,次办上忙,再征海塘费,这正体现了忠王创新思维之处。无论“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在前期是否得到贯彻,它都没有涉及土地所有权问题。而李秀成在苏州主张“先办田凭”,是太平天国新政权对土地关系的重新确认,其政治意义远远重于法律意义。因为这不仅是对政治忠诚者的肯定,也是对政治隔阂或异己者的强制。太平天国后期田凭政策的艰难实施,是在李秀成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从现存史料和文物遗存来看,实施范围主要在他本人直接影响的地区如苏州,以及他的得力助手陈炳文主持的浙江北部地区。其中颁发给花户黄祠墓祭

田凭和花户陈金荣田凭两件文物由忠王直接颁发^{[19]12,14},水师主将翼天义程某发给吴江花户潘叙奎的“荡凭”,也标明“所有各邑,业经我忠王操劳瑞心,颁发田凭,尽美尽善”,^{[19]15}说明田凭政策是在李秀成的亲自督导下推行的。田凭政策是较“照旧交粮纳税”更高层次的社会经济政策,具有国家法律效力。这不仅是李秀成为代表的务实的太平天国领导人研究和总结前期农村政治实践的科学成果,也体现了李秀成推进良性农村政治的决心。

有论者指责田凭政策,认为李秀成在其所控制的苏浙地区,执行了一个统一的承认和保障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政策。^{[20]347}即便如此,太平天国政权以自己的田凭取代清朝的田凭,使原土地所有者必须服务于太平天国新王朝,这种对土地所有权的确认,在不能推行激进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前提下,无疑是最符合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政策,其进步意义毋庸置疑。又有论者称田凭政策仅仅“可以视为一个创造,但并不是什么伟大的创举。因为太平天国颁发田凭首先是为了招业主收租,不是前进措施”,并举证:“从常熟地区的记载看,太平天国的田凭首先是发给地主的,后来才发给了自耕农。”^{[21]220}其实,是先发给地主还是自耕农并不重要,关键是田凭是发给业主还是业主缺失状态下的实种佃农。太平天国既然无意推行激进的土地关系变革,因此在法律上通过田凭政策承认政治上归顺臣服的业主的土地所有权,是强制他们纳入太平天国政治体系,确定他们对天国承担义务的合理措施,不仅应该视为创造和创举,更应该看作是比“着佃交粮”更合乎良性政治轨道的措施,当然可算作前进措施。该论者显然忽视了田凭政策的政治意义。特别是该论者自己也注意到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的“招之汲汲”之所以“应者寥寥”,是由于业主们在佃农抗租斗争高涨时期“报田领凭之后,向农民收租很困难,租额还要受到农民政权的限制,经济上无利可图,反要赔累;在政治上,要向农民政权表示归顺投降受太平天国支配,他们也是不甘心的”。^{[21]221}这正说明太平天国田凭政策的政治意义,使他们骑墙观望于太、清之间的企图难以实现。因为他们“明知租之必不能收,而深虑贼之知为业户而加害不休也”。^{[13]352}李秀成的田凭政策比杨秀清时期的“照旧交粮纳税”,有更明确的责任义务关系。在保留了原有业佃关系的前提下,太平天国当局实际上处于仲裁者的角色:一方面强调“向来地丁、漕粮、田捐、税契无一不由业户自行完纳。每遇水旱借种、借资,业户、佃户情同一室,彼此相顾”的业佃共生关系,另一方面也保持“如有顽佃抗还吞租,许即送局比追,倘有豪强业户势压苦收,不顾穷佃力殫亦许该佃户据实指名,禀报来辕,以凭提究,当以玩视民寡治罪”的公正态度,^[9]对太平天国政权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生产意义重大。

正是由于田凭政策具有如此显著政治意义,才使得部分想借太平军势力谋取私利的乡官竭力阻挠田凭政策的推行,试图模糊业佃共生关系。常熟的乡官局就试图这样做。常熟当局曾试图推行田凭政策。咸丰十年(1860)“九月,贼目出示,着师旅帅重造田册,注明自租名目,招业认田,开呈佃户田亩细数,每亩先缴米一斗,即给田凭,准其收租”,又要“耕种自田领凭,每亩米五升折钱一百二十五文,着旅帅必要催领”,^{[11]55}同时以“长毛告示,不领凭收租者,其田充公”警告。为贯彻田凭政策,太平军厉行查田,“各处田亩要每丘插旗细查,各要不能隐匿”。但效果并不好,因为“长毛查田插旗,一日不过数十亩,而且不能各段同查,只在一图,尚未完毕。余长毛俱吊在外,无多几人,聊以应酬而已”。^[22]太平军施政的虎头蛇尾和缺乏经验给了乡官局变通的机会。在当局要求“业户呈田数给凭,方准收租。每亩出田凭费六十,又欲呈田契钤印图取税银”时,被“曹和卿劝止。现设公局于西庄存仁堂,议各乡租米归粮局代收,其盐务则报各乡着军师帅销卖,领价每斤十八,捐难民局二文,钱帅归四文,各局赚四文,定价二十八”。^{[12]73}可见,田凭政策在曹和卿等地主绅士的“劝止”下没有成功推广。他们为了实现由公局代收各乡租米的制度,利用太平军当局以征粮为要务的心理,把领凭收租变通为公局代收,利用自己对地方行政的熟悉,把持粮、盐等各项收入,进而达到中饱私囊的目的。虽然公局办法由于征收面广,而在效率方面优于地主领凭收租,但地主这一关键环节被人为蒸发,说明太平天国当局希望业佃互利和减租赋的意图在具体操作上有被歪曲的可能。

但李秀成主持颁发田凭的政策,仍然是对原有土地关系的确认,在保护原有田主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保护他们的收租权利。因此这项政策虽然有很强的政治性,却丝毫不具备任何革命性变革的意义。只有1862年吴江监军钟志成推行的田凭政策,才真正具有了土地革命的涵义。“(正月)二十七日,伪监军提各乡卒长给田凭,每亩钱三百六十,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农民窃喜,陆续完纳”。^[23]比较常熟业

主对田凭的冷漠态度,比较常熟佃农对乡官局代收租粮的激烈抵制,同里佃农对待田凭的欣喜和通过“陆续完纳”对太平天国的支持,都说明对农民来说,土地所有权才是最根本的诉求。钟志成的田凭政策是对李秀成地方建设新思维的发展。钟志成是在1862年初开始颁发田凭的,这之前的一年多,“着佃交粮”肯定也在实施,实际情况怎样很难确定,因此钟志成到底为什么承认了佃户对实种土地的所有权便模糊不清。有论者认为“着佃交粮”必然会过渡到颁发田凭,对此笔者持否定态度。因为目前向业主缺失状态下的佃农颁发田凭的史料根据只有钟志成一例,且钟氏并非太平军贵族,而是乡官,他的施政不具有普遍性,不代表苏福省太平天国当局的基本施政原则和方向。相反大量史料表明,太平天国当局仅仅把田凭发给原业主,作为他们收租完粮的法律依据;对“着佃交粮”的佃农,仅仅向他们强调他们代原业主完粮的义务。至于史料中这些佃农代交田凭费的记载,则更说明他们并未实际领到田凭。

综上所述,从前期的“照旧交粮纳税”到后期的“着佃交粮”和颁发田凭,太平天国起义者逐步深化着自己对农村政治的认识和实践。“照旧交粮纳税”政策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随着西征的展开和统治方式的转变,很自然采取的社会经济政策,与《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条件与否以及天京粮荒没有必然逻辑关系。后期苏福省、浙江省当局普遍实行的是“着佃交粮”与“招业收租”并举的政策。“着佃交粮”不仅没有改变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土地所有权关系的现状,也没有减轻佃农的社会负担,因此不具有任何社会经济变革意义。太平天国当局颁发田凭,是太平天国农村政治中最高水平的社会经济政策,其政治意义大于法律意义。但即便如此,仍然不能作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发挥革命性作用,因为它仅仅是对现有土地关系的确认。只有1862年吴江监军钟志成推行的田凭政策,才真正具有了土地革命的涵义。

参考文献:

- [1] 罗尔纲. 太平天国史:第二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 [2] 郭毅生. 太平天国经济史[M]. 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 [3]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G].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4] 茅家琦. 太平天国通史:上册[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5] 王明前. 太平天国政治文化的多元因素[J]. 晋阳学刊,2006(1).
- [6] 邹树荣. 蒿青诗草[G]//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 太平天国资料.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72.
- [7] 李滨. 中兴别记:卷九[G]//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二册上. 北京:中华书局,1979:145.
- [8] 张德坚. 贼情汇纂:卷七[G]//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 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203.
- [9] 甌天安办理长洲军民事务黄酌定还租以抒佃力告示[G]//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 近代史资料:总34号. 北京:中华书局,1964:2-3.
- [10] 甌办长州军务甌天安黄委照办事[G]//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 近代史资料:总34号. 北京:中华书局,1964:3.
- [11] 柯悟迟. 漏网喁鱼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2] 龚又村. 自怡日记[G]//罗尔纲,王庆成.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六).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13] 曾含章. 避难记略[G]//罗尔纲,王庆成.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五).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14] 王彝寿. 越难志[G]//罗尔纲,王庆成.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五).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53.
- [15] 罗尔纲. 太平天国史事考[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 [16] 范城. 质言[G]//罗尔纲,王庆成.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四).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20.
- [17] 罗尔纲. 太平天国文物图释[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
- [18] 勸天义兼苏福省文将帅总理民务汪宏建钧谕[G]//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 近代史资料:总34号. 北京:中华书局,1964:1.
- [19] 罗尔纲. 太平天国文物[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 [20] 牟安世. 太平天国[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 [21] 蔡少卿. 李秀成与太平天国江浙地区的土地政策[G]//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 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第一册.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22] 佚名. 庚申避难日记[G]//罗尔纲,王庆成.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六).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23] 倦圃野老. 庚癸记略[G]//罗尔纲,王庆成.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五).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小田)